

XUGUI JIAOSHOU JIUSHI HUADAN
JINIAN WENJI



徐 规 教授 九十华诞纪念文集

张其凡 李裕民 主编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

徐 規 教授 九十华诞纪念文集

徐国治 李国治 主编

徐 规 教授 九十华诞纪念文集

XUGUI JIAOSHOU JIUSHI HUADAN JINIAN WENJI

张其凡 李裕民 主编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徐规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

张其凡 李裕民 主编

责任编辑 王 萍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50

字 数 980 千

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9490-550-5

定 价 1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(0571) 88925591



徐规教授一九九三年摄于杭州大学历史系

序

今年3月23日,是尊敬的宋史专家徐规先生九十华诞的大喜日子。过去人们常说: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,如今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,七十早已不算稀,八十也多起来了,但能活到九十的,特别是对一生勤奋治学而又饱经风霜的专家来说,就太稀少了。15年前,我们曾发起出版过一本《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》,今年更应该编印一本分量尤重的纪念文集,于是,几位朋友一起商量筹办此事,因为我是其中最年长又最早得到徐先生指导的学生,就推我写序,我有些为难,但又找不出理由推辞,只好勉为其难了。写什么好呢?我想就谈谈五十年前,我得到先生指教的亲身经历吧!

1959年高考时,我填的第一志愿,就是杭州大学(今浙江大学)历史系,没有想到一考就中了,于是从一个小县城跨进了省城的大学。我的祖父没有上过学,父亲也只上了初中,大哥连初中都没有上完,因为家庭经济困难,中途辍学了。我是我家第一个大学生,当时没有往远处想,要当什么专家之类,只想多学点知识,不能虚度光阴。我自幼酷爱历史,而一进校,正碰上教育改革,原来的通史课停开了,只上几节专题讲座,剩下就是自学,这太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了。徐先生为人和善,对学生特别热情,他的家离上课的教室很近,有一次,我就斗胆上门拜访。他住的单身宿舍,大约十多个平方米,陈设简陋,家属远在温州,只能自己照顾自己,一望而知,日子过得相当清贫。先生没有一点架子,很愿意和我谈学问,说话很实在,也很直率。最使我吃惊的是:有一次他对我说,你比系里的助教强。大概基于这样的认识,先生对我像传授研究生那样,毫无保留地把看家本领都教给了我。先生写的论文、做的笔记,都给我看,常谈读书、研究的经历和心得。先生特别佩服老师张荫麟。有一个故事,给我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:张荫麟十几岁时,去大学旁听梁启超的课,对梁的观点有不同意见,写成论文发表了,稿费寄到了清华大学的教授宿舍。梁在课堂上问:是谁写的?最后从教室角落里站起一位年轻人来,梁看他很有才,就收他为关门弟子。这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一个有出息的学生,不能满足于接受专家传授的知识,更应该独立思考,追求真理、修正错误。而真正的专家权威不但不会去压制不同意见,反而持欢迎态度,甚至进而努力去培养他。1965年,我曾对先生的成名作《李焘年表》提了一条意见,先生复信辩驳,我再作进一步申述,最后先生采纳了我的意见。现在想起来,这似乎有点像前事的重演吧!

蕭山書院藏書

1963年我国第一次公开招收研究生,从公布消息到考试,只有一个月时间,要考四门课,来不及复习。况且,杭大是四年制,北大是五年制,我们少学一年,又没有听过导师的课,怎么能考过北大学生?因此,我一开始没有报考,到截止报名的一天,系里领导来动员,我才勉强答应。心想要考就考最好的,考不上也不丢人,我就报考了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名下的宋史研究生。考试的专业课是宋史,专业基础课是唐史,指定参考书为《资治通鉴》和《续资治通鉴》。这两大部书,一年也看不完,我看了几天后,设法从别人手里借来了油印本中国古代史讲义,是徐先生在教改前编写的。它与一般讲义或现在的教科书都不同,有自己特色:各章的每一节是按问题编的,每节都有一个主题,像一个问答题的标准答案,各节尽量参考新的研究成果,在节下注明,其中有不少是邓先生的论文。看了它,使我很快掌握了各历史时期的要点,和近人研究的新进展。最后,我专业课的考分竟然超过了北大的考生,应该说,徐先生的讲义起了很大作用。考完后,即归还了。不知徐先生或其他人手里现在还有没有保存这一讲义,它实在有正式出版的价值。在考试期间,徐先生非常关心我,一天上午考完唐史,我才知道,考试题型除了问答题,还有名词解释。即找先生简单说了几句,先生一吃完中午饭,就急匆匆赶来看我,提醒我下午考宋史应该注意什么。

1963年初,在研究生考试结束后,我就全力投入毕业论文的写作。徐先生当年写的毕业论文是《李焘年表》,我就仿效着写《刘恕年表》,连续几个月,除了上课,就是去资料室或图书馆,这中间没有找先生辅导。我是有意要按平时从先生那里学到的方法,独立去完成,看是否真正掌握了;当论文交给先生看后,评价很高,认为是全年级里写得最好的论文,把我的论文和收集的好几万字资料,都拿去公开展览。此时,邓先生又通过学校将我的论文要去,看后比较满意,才最终决定录取。当时,招生数量很少,浙江省考上文科研究生,总共两名(历史就我一人,另一名学生是学中文的)。谁都知道,我能考上北大的宋史研究生,得力于先生平时的指导,这件事,在校内引起很大反响。此后每届学得最好的学生都想接受先生的指导,报考宋史研究生,并通过先生介绍与我联系。然而做梦也不曾想到,这好事后来却成了罪状。

1966年“文革”一开始,就来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。根据我在北京大学的见识,推测先生的处境不妙,我不敢写信,因为任何语言都可以被曲解,就寄去一些资料,表示有人在关心他,但始终不见回音,后来才知道,先生一次都没有收到。我很为之担心,可又无法获知具体情况。9月初,大串连刚开始,还很少有人敢走动时,在历史系的教师和研究生中,我第一个闯了出去,直奔杭大。远远地看见先生挂着一块大牌子,先生大概也看见了我,怕惹来更多的麻烦,扭头走开了。当我来到系里,看见满墙贴的大字报,揭发先生反动权威、漏网右派的十大罪状,其中赫然有一条,培养我当上了北大的研究生。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,怎么为国家培养人才也

是罪？逻辑很简单，“文革”中宣传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，研究生知识比本科生多，你培养了，自然就是反动派了。那么按照这个逻辑，我也应该是反动派了，不，那有另一条道理管着：学生是革命动力，研究生和本科生一样，也是革命动力。按理说，既然我是革命动力，培养一个革命动力，怎么能算反动呢？这从逻辑上是解释不通的，但这个道理没人讲。“文革”中的奇怪逻辑，没有亲身经历是怎么也想不通的。我是从革命中心北大出来的，当然能理解，但触犯了我恩师，我非常愤怒，在学生宿舍住了几天，想看一下他们对我怎么样，也想了解一下究竟是谁干的，但毫无结果，也无人碰我。

四年的大学生活，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徐先生，得到了真传，掌握了治学方法，等于在先生身边，当了本科、研究生连读的弟子。先生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：考证是做研究的必备的基本功，作年谱是练习考证的一条捷径。提高论文水平的最佳办法，便是不断地修正错误。先生的大学毕业论文《李焘年表》，过了20年才发表。对我的毕业论文《刘恕年表》，先生在称赞的同时，又让我先放着，我是过了15年，做了不少修改补充才发表的。做学问，必须耐得住清苦。先生的家庭负担重，很清贫。长期两地分居，放假回家时，得先乘火车到金华，再换长途汽车到温州，旅途很辛苦，而先生乘火车从来都是买的硬座。有一次，从家返校，跟我说：这一回，坐上了卧铺。我颇感惊讶，先生又说：途中突然刹车，许多人摔倒了，我的头被碰破了，列车长特别安排到卧铺包扎，一直卧到杭州。先生虽然生活清贫，却不曾因此而放松研究。我上大学时，家里很穷，我没有买过一颗水果、吃过一粒糖。放假了，还得做临时工，挣钱供上学用。那时，大学生没有打工的，就是我例外。上北大当研究生了，身上穿的都是补丁衣服。到农村搞“四清”，农民以为我是化了装下去的，我说：在校就是这一身。他们还不信。为了多一点时间搞研究，大学、研究生时期，我几乎没有看过电影，稍微有点零钱，就去买书。

做学问，还要经得起挫折。解放后，运动一个接着一个，先生受过刺激，但他身体一好，照样做研究：“文革”挨了整，一旦情况改变，依然踏踏实实做学问，不断推出新成果。我也受先生的影响。“文革”中，几乎无人敢读书，而我就在那时秘密自学古文字，当1972年恢复《考古》等三大杂志时，我就开始连续发表论文了。这一件事表明，只要基本功扎实，即使去钻研从未涉及过的学科，也是可以研究出成果来的。

几十年来，我每出一本书，总要给先生寄去，先生也总是认真阅读，写一封长长的信，指出优点，为我做出成绩而高兴；另一方面，也总要指出缺点，即使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。这使我时刻警惕，学问无止境，错误和缺点如同灰尘一样，是难于扫净的，必须时时留意，不断改进，水平才能逐年提高。

五十年了，我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变成了古稀老人。回想我五十年的努力，能较早取得一些成果，得益于当年先生的悉心教导，帮助我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，这

是我永志不忘的。一个人想在做学问的道路上,少走弯路,早出成果、出好成果,必须有一个高水平导师的指导。我也一直以先生教我的模式培养研究生,希望能把这一好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

先生的九十年,体现了我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。不争权,不谋利,全心全意、踏踏实实做学问,无代价、无保留地培养后学,总希望自己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为繁荣学术作出新贡献;先生无私的品格、敬业的精神,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。

我们谨以这本纪念文集献给尊敬的徐先生,作为九十大寿的礼品。

永远不忘先生大恩的学生李裕民敬书

2009年2月10日于西安

目 录

序	李裕民
一 回忆文章	
003/勤于剪枝勤灌溉 呕心沥血育人才 ——记徐规先生指导研究生做学问	何忠礼
007/师门受教忆点滴	曹家齐
010/师道楷模才德举世景仰 考辨精辟著述百代流芳 ——记著名宋史专家徐规先生	康保苓
014/时代·师生 ——写在徐师九十华诞之际	杨天保
018/解读《仰素集》 ——徐规先生治学风骨初探	张明华
025/一封信的标本意义	程民生
030/记徐规先生	吴松弟
二 学术论文	
037/北魏离散诸部问题考实	李 凭
050/均田令中的“桑田二十亩”与“课种桑五十株”	李伯重
058/唐宋白麻规制度研究	龚延明 沈小仙
069/杜佑的经济和政治思想	李清凌
085/晚唐五代宋初土地过户的法律标志——户状	刘进宝
092/五代宋初侍卫亲军制度三题	曾育荣
101/试论 10 至 13 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	虞云国
114/宋代人口研究新论 ——兼与吴松弟教授商榷	方 健
169/宋代经济发展水平再评价	葛金芳
181/宋代的粮食市场探析	魏天安

徐规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

200/宋代民匠差雇制度述略	包伟民
227/宋朝与交趾的贸易	黄纯艳
237/酒与宋代社会	李华瑞
252/宋代两浙地区的乡村集市	陈国灿
265/论宋代两浙人的特性与两浙经济的发展	周生春
280/宋代中央权力架构中监察权之地位作用浅析	季盛清
288/宋代“实封投状”法探析	郭东旭
297/宋朝审计机构的演变	肖建新
313/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归明人的政策	戴建国
325/论宋朝对西北边区民族的统治体制	安国楼
338/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	王 棣
353/宋代科举唱名赐第与期集仪制	祖 慧
365/宋代书判拔萃科考	曹家齐
383/试论宋代社会中的礼俗矛盾	范 荧
394/论两宋理学家的历史哲学	范立舟
410/理学与两宋史学的趋向	刘连开
420/论“格物穷理”	
——《近思录》研究之一	姜锡东
444/作品、产品与商品	
——宋代与文学作品商品化的一点考察	王水照
456/程朱理学中的诚敬理论与道德伦理建设	罗家祥
465/论赵宋之统一与整治	杨渭生
480/北宋黄河东北流之争与朋党政治	邹逸麟
499/试论北宋中后期文化重心的特色	康保苓
507/“铁面御史”赵抃研究	张其凡 白效咏
559/范仲淹与庆历科举改革	张希清
575/范纯仁生平事迹钩沉	王 茜
583/北宋“画学”与“翰林图画院”	蔡 罕
589/南宋四川官盐与地方财政	梁庚尧
600/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富民强国思想	方如金
613/论永嘉事功学派的史学思想	鲍永军
620/南宋史家的承旧与创新	
——兼论对元明史学的影响	王德毅

633/论陈傅良的民本思想

——纪念陈傅良诞辰 870 周年

俞兆鹏

644/叶适论道学与道统

何俊

675/近代山西煤矿业的发展与制约

马伟

三 文献考论

703/义理、考证、文章三结合的学术精品

——读徐规教授的《仰素集》

方建新

710/《南宋科举制度史》序

何忠礼

718/论重新整理《旧五代史》辑本的必要与可能

——《旧五代史》辑本及其点校本

陈智超

734/《云庄集》真伪考

蔡东洲

746/文渊阁四库本《周元公集》的提要及底本问题

粟品孝

750/四库全书编纂中删削宋集青词疏文等考辨

汪圣铎

762/四库全书宋人著作提要订误

李裕民

附 录

787/徐规先生所培养的研究生名录

后 记

张其凡

一 回忆文章

勤于剪枝勤灌溉 呕心沥血育人才

——记徐规先生指导研究生做学问

何忠礼

浙江大学(原杭州大学)历史系宋史研究室主任徐规教授,是我国著名的宋史专家。他那谦虚、诚恳的为人,谨严、笃实的治学态度,早为人们所熟知。至于他诲人不倦、甘为人梯,精心培养年轻教师和学生的事迹,说来更是十分感人。我有幸在他指导下度过了三年研究生生活,所受教益尤为深切难忘。现仅就徐师在大力培养和教育研究生方面的工作,谈一些粗浅体会。

一、重视对研究生基本功的训练和培养

徐师常说,一个刚入学的研究生,虽然已较好地掌握了大学本科的知识,但要从事复杂的中国古代史研究,其知识和功力是远远不够的。为此,必须在拓宽知识面的基础上,加强基本功的训练。那么,中国古代史研究生的基本功是什么呢?他认为,一是要具备相当的古文阅读能力;二是要有较高的论文写作能力;三是要掌握史科学、目录学、避讳学、校勘学、版本学等多种基础知识。

为了提高研究生的古文阅读能力,并打开宋史史料的宝库,徐师继承他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时的老师张荫麟、陈乐素两位教授的经验,给新入学的研究生布置的第一个学习任务,是要求每人用半年左右时间,逐字逐句地通读一遍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,学生在通读过程中,遇到不能句逗或者意义不明之处,徐师便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予以指点。1979年以前,点校本《长编》尚未问世,徐师为此亲自手抄了《长编》开头的十卷,计十余万字,并详加点校,供我们作对比阅读之用。平时,他常常指定《长编》或宋人文集中的某一段文字,要学生当场标点并解释大意,以此检查大家通读和理解古文的能力。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,不仅使我们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北宋一代的史实,而且较快地提高了古文阅读水平,攻克了从事宋史研究的“语言文字关”。

所谓论文写作能力,主要的不是指一般的写作技巧,而是指撰述史学论文的才、学、识。徐师经常提醒大家,要写出一篇有质量的文章,从选题到资料的搜集、鉴别、运用都得下苦工夫,不能走捷径。他要求学生在确定论文选题时,必须摸清前人包括外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达到的深度和广度。他反对写东拼西凑的

余英时文集

大杂烩式文章,认为这种没有新意的文章,徒然浪费笔墨而已。他还认为,文章虽有新意,材料必须过硬,在论据尚嫌不足的情况下,切不可仓促成篇。后来,宋史研究室按照他的意见,编印了一部《宋史论文索引》(1900—1980),主要就是为研究生提供有关专题研究的信息而编纂的。

徐师早就指出,“以论带史的说法,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,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以理论为指导,论从史出”。所以他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,认为有了足够的史料,是完成论文写作的基本保证。他要求研究生勤读书,勤做笔记和卡片。卡片积多了,要进行科学分类,否则到用时就会不知所措。在引用史料时,一是要尽可能找出其原始出处,有第一手资料,就不能用第二手、第三手的资料,更反对将别人文章中所引用的史料一抄了事的不负责任作风。如果同一史料有不同版本,就要广为罗致,取其所长。因为有时一字之差,意思就会大异,影响论文的正确性。二是要认真做好史料的鉴别工作。徐师根据自己多年治学经验,认为宋代笔记较多,这固然为后人增添了一条采摭史料的门径,但其中所载史事,正如宋人自己所说,“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”(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四《野史不可信》)。故内容失实者不胜枚举。这种情况,即使像司马光、欧阳修那些史学大师的笔记,也不例外。因此,在引用史料时,必须细加考订。正史、会要等记载一般较野史、杂说可靠性为好,但也不可轻信。

为了使研究生打下从事研究工作的扎实基础,徐师除了亲自为研究生开设“宋史专题研究”课以外,还指定中国古代目录学史、史料学、史源学、校勘学等课程为每个研究生的必修课。有些课,限于本系条件,一时尚没有能力开设,徐师一面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,让大家外出听课,一面指定某些著作,让大家去自学。如陈垣先生的《史讳举例》、《校勘学释例》等,都是研究生们必读的参考书。

二、通过批阅研究生论文,实行面对面指导

徐师常说,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,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锻炼和提高,成功的经验固然好,失败的教训也很宝贵。他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心得,每年撰写一至两篇论文或习作。徐师虽身兼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,教学、科研和各种工作非常繁忙,但对研究生们的每一篇文章,他都极其认真地进行批阅。从题目、内容到考订精粗,从用字遣词到标点、错别字,无不一一加以探讨并作修改。尤其对文章中所引用的每条史料,他都要找到出处,仔细加以核对。为了批阅一篇文章,往往要通宵达旦地费上几天时间,一次又一次地出入资料室、图书馆,用力之勤恰如对待自己的著述一般,使大家无不为之感动。记得我的一篇习作《“兀术遗骸书”说考辨》,全文不过五千字,可是他足足审阅了两个晚上(徐师每天大都要工作到次日一二点钟才睡觉)。修改过的地方竟多达两百余处。徐师

对研究生极端负责的精神,对我们研究生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鞭策。

当然,徐师指导论文,并不局限于修改了事,他每将一篇文章批阅完毕,总要将那位学生邀去,耐心地、逐字逐句地做分析和讲评,同时征询学生意见。徐师鼓励研究生说:“学撰论文,总有一个过程,开始时,挑毛病多一些,但绝不可气馁。修改后的文章,拿回去后还得好好想一想,为什么要这样改,经过反复揣摩,错误就会越来越少。到我没有可以替你的文章改动了,你就毕业了。”他曾坦率地告诉大家,这种通过批阅论文,面对面地指导研究生的方法,是从自己的业师张荫麟、陈乐素两位先生那里学来的。作为徐师的学生,我们感到这种有的放矢的教导,给大家的帮助特别大,使我们切实地学到了许多做学问的本领,可以说一辈子也受用不尽。

三、教书育人,甘为人梯

徐师待人宽厚,不尚虚辞,而对研究生在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却很严格。当然,这种严格的要求,大多通过自己的表率作用体现出来。

他教导学生要扎扎实实地做学问,不急于发表文章,不要追名逐利,切忌趋时曲笔。他说,某些粗制滥造的东西,仰承权贵鼻息的文章,发表后或许可逞快于一时,但对学术研究无益,并且最后会使自己感到汗颜,甚至抱恨终身,追悔莫及。确实,徐师从不匆忙发表自己的论文或专著。他每写完一篇文章,一定要请人看看,请其他老师看,有时也请学生们看。这几年来,他所发表的文章,事先我都是拜读过的。当然,这也是徐师培养研究生的一种方法,希望通过这种实践得到提高。不论老师或学生,只要所提意见有合理之处,即使一个标点他都立即修正。他对自己的文章总是一改再改,几经重抄。重抄又从不请别人代劳。徐师认为,抄稿子的过程是一个继续深入思考、纠正错误的过程,如果失去这一机会那是很可惜的,这就是他不愿意学生帮助他抄稿子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他有许多研究成果,只要稍做整理,即可付梓,可是他总觉得尚欠成熟,不肯轻易拿出来发表。一些出版单位向他约稿,经常被他婉言谢绝。他的这种一切以事业为重、不好名利的作风,使大家深受教育。

徐师认为,一个做学问的人,应该具有诚恳谦虚的品质。他对史学界的前辈十分推崇,常常如数家珍地介绍他们的治学经验和科研成就。对同辈也很尊重,即使学术观点上有分歧,总是严于律己,很少谈及他人的短处。对晚辈的爱护和关心更是不用说了。徐师说,学术研究的领域十分宽广,个人的智慧和精力毕竟有限,只有互相磋商,取长补短,通力协作,才能多出成果,出好成果,否则只会两败俱伤。他要我们增强团结,力戒骄傲,彻底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文人相轻的恶习。

本来,研究生协助自己的导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,如誊录、校对、查找资料